

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

霍巍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市 610064)

一、突厥王冠的考古发现

2001年8月,一支由土耳其和蒙古考古学家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位于今蒙古国首府乌兰巴托以西45公里的鄂尔浑河畔突厥第二汗国毗伽可汗陵园内,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金银珠宝,被学术界称之为“毗伽可汗宝藏”(Treasure of Blige Khagan)。这一发现后来由我国考古学家林梅村较为详尽的介绍给国内,从而也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①。在这批宝藏当中,有一顶王冠十分华贵醒目,林梅村从蒙古国立历史博物馆编的《毗伽可汗宝藏说明》一书中转载了这顶王冠的照片^②,使我们可以观察到它的一些细部特征:这顶王冠为一顶金冠,王冠冠沿为一长条形的带状金边,在这条金边的上下两条边缘上钻出若干小孔,可用来连缀其它金片,在这条金边的正中和左右两方各鏊出一个大孔,可能原系用来镶嵌宝石之用。在这条金边的上缘部,与之相垂直连缀有五片金叶形冠片,形成一顶五花叶片金冠。其中,中央一片冠叶较为宽大,叶片上部为一花形,下部为一带有两翼的神鸟,神鸟身躯正中镶嵌有一颗红宝石。在这片冠叶的花形和神鸟的两翼上各遗有一大孔,估计原来也系镶嵌宝石之处,后因宝石脱落后遗留下这样的孔洞。在这片中央冠叶的两侧,各连缀有一大一小两片冠叶,形状均为长条形,其中较大的一片冠叶上面遗留有两个形状略呈梅花形的孔洞,较小的一片冠叶上面遗留有一个略呈梅花形的孔洞,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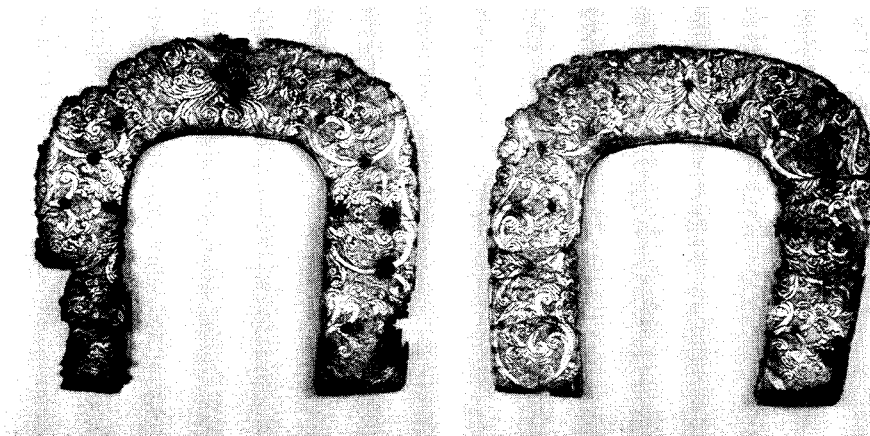
镶嵌的宝石已脱落。冠叶上以细密的鱼子纹为地,饰有浅浮雕的缠枝花纹(图一)。林梅村考证认为,这只象征突厥可汗王权的王冠上的神鸟,实际上是一只猎鹰,即辽代所谓的“海东青”,所以他也将这顶王冠称之为“突厥可汗的海东青王冠”。

据林梅村介绍,这顶王冠是和它的金银器皿一起被发现的,对于证明其主人的身份有所帮助:“据说这批金银珠宝是在毗伽可汗陵园内一个宗庙的基础下发现的,数千件宝物皆出自宗庙下埋藏的一个百宝箱,据统计,百宝箱外装饰的各类银花达1850片,箱内则满载各种金银器皿、金腰带、金冠、金牌饰、金耳环等。此外,出土遗物还有许多名贵的宝石、纺织品残片、铜钉、铁饰件残片等。金器类最重要的发现,莫过于带神鸟浮雕的黄金王冠,上面镶嵌了一颗象征王权的名贵宝石。金腰带亦为突厥可汗王权的象征,与陵园内毗伽可汗石像上雕刻的腰带几乎完全相同。金冠和金腰带的发现,使发掘者确信这个宝



图一 蒙古发现的突厥毗伽可汗王冠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CC)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图二 U字形银饰片

藏属于毗伽可汗私人所有”。

突厥汗国毗伽可汗王冠的发现，同时也引出了另一个相关问题的探讨，即吐蕃王冠存在的可能性。

二、流散海外的吐蕃王冠

2006年8月，笔者获美国亚洲文化协会（ACC）学者计划“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调查与研究”项目资助，赴美国各地进行学术调查与访问，在美国各界朋友和同行的帮助之下，获得不少现在流散海外的吐蕃文物的新资料与新线索^③。其中，美国芝加哥某私人收藏家所收藏的一批吐蕃金银器是笔者调查了解到的目前未曾公布于世的最为重要的一批新资料。这批材料当中，有一些残破的银饰片，形制特殊，曾经引起笔者和其他一些学者的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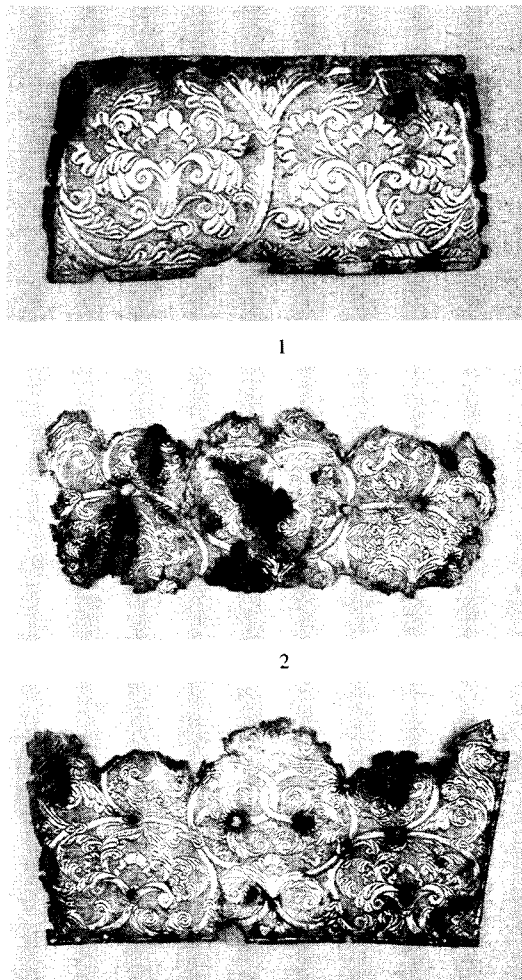
这批银饰片数量较大，均为残片，有大有小，和突厥毗伽可汗金冠发现情况相似之处在于，它们也是与丝织品、金银器、鍍金马鞍等一批珍贵的物品一同被发现的，虽然对其出土背景我们了解不多，但根据器物种类、组合及保存现状等线索推测，很可能是出土于一座高规格的吐蕃时期墓葬当中^④。银饰片中相对保存情况较好，可以基本确定其形状者有几下几类：

1. “U”字形饰片（私人收藏号80C-2A、5A），2件。银质片状，形状略呈“U”字形。饰片以鱼子纹为地，表面凸显连续变化的忍冬纹样，饰片边缘部位残存有若干小孔，可供穿缀之用，另在饰片中心部位还残存有数个较大的孔洞

（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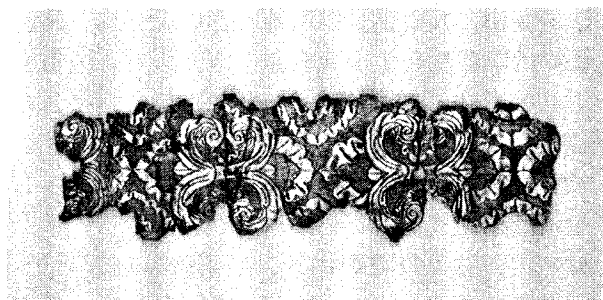
2. “山”形饰片（私人收藏号80C-1A、4A），2件。银质片状。纹饰特点与上述银饰片相同，也是以鱼子纹为地，其上凸显连续变化的忍冬纹样，边缘部残存有若干小孔，饰片居中位置残存有数个较大孔洞（图三，2、3）。

3. 长条形饰片（私人收藏号80C-7B、7F、6A），3件。银质片状，呈长条形。也是以鱼子纹为地，其上饰以忍冬纹。饰片的四周均有边框，在边框上穿有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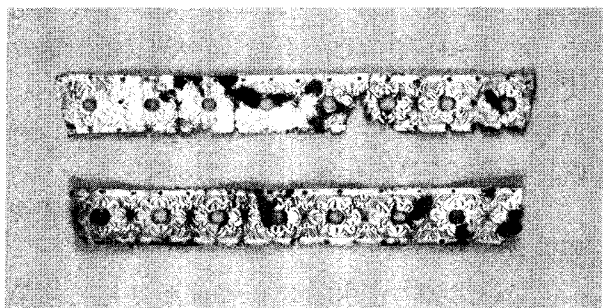


图三

1. 长条形银饰片 2、3. 山形银饰片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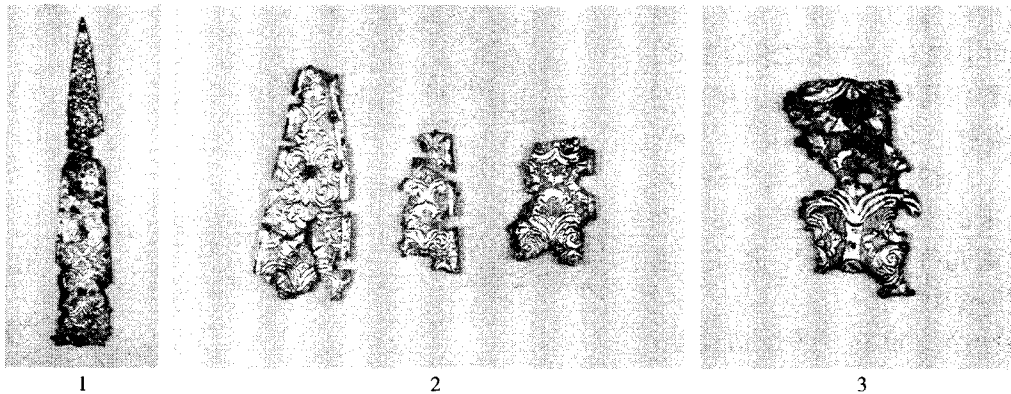
2

图四

1. 长条形银饰片 2. 与三角形银饰片可组合使用的长条形银饰片

孔。其中编号为 80C-6A 的一件银饰片呈长条梯形，以鱼子纹为地，其上凸显出两组忍冬团花纹样，四边有边框，边框上留有若干小孔，可供穿缀之用（图三，1；图四）。

4. 三角形饰片（私人收藏号 80C-7A、7C），4 件。银质，呈长条三角形。银饰片以鱼子纹为地，其上饰以忍冬缠枝花纹，两侧边框上残留有若干小孔（图五，1、2）。此外，还有一些银饰片的残片，收藏者未登记入号，从其质地、形制与纹饰特点等观察，也与上述银质饰片



图五

1、2. 三角形银饰片 3. 银饰残片

同属于某件特定物体（图五，3）。

若将这批银饰片与前文所述的突厥王冠上的金饰片做一番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第一，其形状都是片状的金银器饰片，在其边缘上穿有小孔，可用来与其它片饰相连缀；第二，有的饰片表面均遗留有较大的孔洞，很可能是原来用来镶嵌宝石之类物件所遗留下来的痕迹；第三，饰片的纹饰均以鱼子纹为地，上面凸起浅浮雕式的花卉（如缠枝、忍冬等）纹饰。

对于这批银饰片的用途，笔者出于慎重一直没有做出过推测。但在笔者之前，著名的俄国中亚考古学家马尔夏克应收藏者之约，曾对这批金银器做过复原研究，他的初步意见是将上述银饰片按其形制分成两大部分：上文中第 1、2、3 类银饰片他认为有可能是两顶吐蕃国王和王后分别使用的王冠残片；而上文中第 4 类呈三角形的银饰片他认为有可能是一个呈三角形的纪念性物体表面装饰的银残片（图六，2）^⑤。由于第 4 类呈三角形的银饰片特征十分突出，笔者基本同意马尔夏克的意见。而第 1、2、3 批银饰片究竟可能属于何种用途？马尔夏尔所提出的它们可能属于两顶吐蕃王冠的复原设想是否合理？都是一些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问题。突厥王冠的发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线索。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马尔夏克提出的复原方案：他根据这批银饰片的形状特点，将其重新加以缀合，组成一组王冠的想象复原图：首先，他将第 1 类呈“U”字形的银饰片竖立起来，作为王冠的背冠部分；然后，再将第 2 类呈“山”字

形的银饰片放在背冠的上沿下方，形成王冠的冠首部分；最后，他将第3类长条形的饰片分别放置于“U”字形王冠的两翼，作为王冠的冠耳，其组合方式如图所示（图六，1）。

突厥毗伽汗王冠出土及资料披露之后，笔者重新审视马尔夏克对这批银饰片的基本判断，不能不承认这位资深的中亚考古学家是颇具眼光的，如果进一步结合吐蕃时期其它图像资料来加以对照，有迹象表明吐蕃王国时期，吐蕃赞普（国王）的确可能流行一种带有冠叶的高冠式王冠式样，可以支持马尔夏克所作的推测。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吐蕃时期赞普的画像或者雕塑实物十分有限，主要可供对照的资料一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在石窟绘画中留下的吐蕃赞普形象，二是在吐蕃本土或其占领区内出现的作为吐蕃赞普化身的大日如来佛像。两者的头饰与冠饰均可作为我们考察吐蕃王冠形制的重要参照。

敦煌石窟中出现的吐蕃赞普图像具有代表性的可举出以下各例：

1. 敦煌第158窟《佛涅槃变》壁画中的吐蕃赞普

此幅壁画据法国学者海瑟·噶尔美介绍，系伯希和发表在《敦煌石窟》第一卷中的图版第六十四，表现的是两位侍从陪伴吐蕃赞普率领从臣悼念佛涅槃时的情景^⑥，现存石窟壁画中吐蕃赞普的头部已被损毁。此窟中的《佛涅槃变》壁画在卧佛足旁，绘有各国王子群像，其中立为众王之首者即为吐蕃赞普，从伯希和早年拍摄的照片上看，壁画中的赞普头缠高头巾，这种高头巾的结束方式十分独特：巾角一端从右侧伸出，头巾上箍有三瓣花瓣形的王冠，头巾上的管状褶纹十分明显。壁画左上方的涡卷纹上书有藏文题记：“Bod-Btsan-po”（蕃赞普）以及其它一些尚未辨别出来的文字，但据此噶尔美确认“这幅画几乎毫无疑问，是在吐蕃占领时期创作的”^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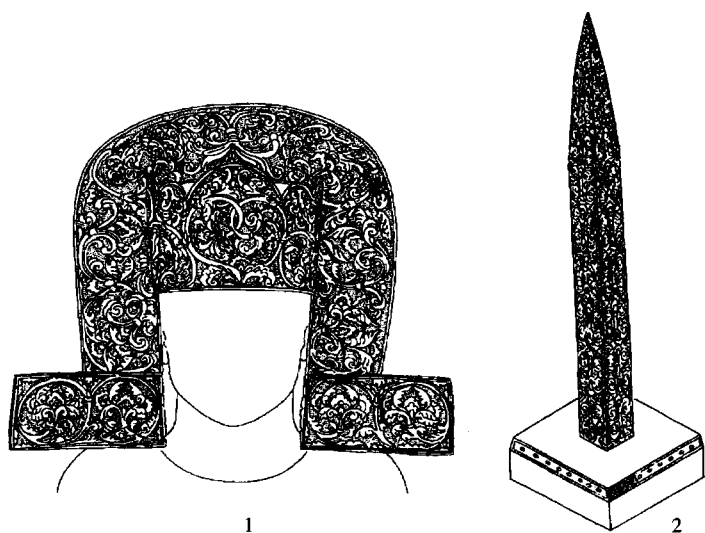
2. 敦煌第159窟《维摩诘经变》中的吐蕃赞普形象

此窟所绘制的《维摩诘经变图》绘出维摩诘帐下各国王子前来赴会听

法的场面，其中也是以吐蕃赞普居于首位。此壁画中的吐蕃赞普头上缠有高巾作为头冠，噶尔美对其的描述是“赞普头披一条白巾，王冠上缠绕着一条管褶形笔直的红色头巾”，外穿一件翻领长袖大衣，大衣衣领为三角形翻领，从大衣的领口处可见其内着黑色的小衫。腰束皮带，带上佩短刀，右手擎香炉供养，足下著黑色的靴子。从壁画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吐蕃赞普的头发用丝绸扎成辫子，同时，在耳朵附近把辫子扎成花结，这是一种在西藏中部地区至今流行的时髦发式。噶尔美提到，在这幅作品边缘的涡卷纹上，也写有藏文“Bod-iBtsan-po”（蕃赞普），所以其年代也应是在吐蕃占领敦煌时期^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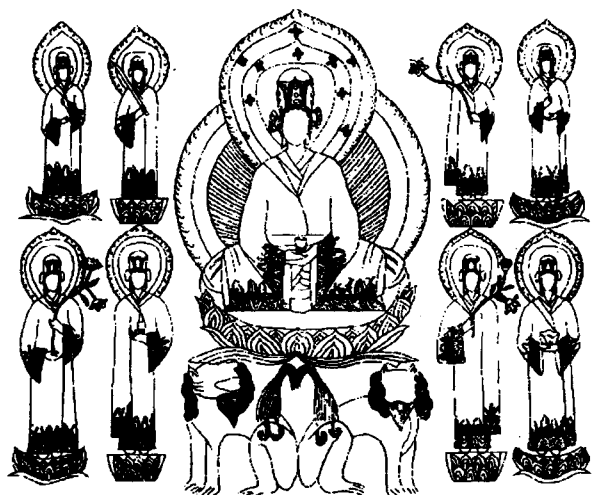
3. 敦煌第237窟《维摩诘变》中的吐蕃赞普形象

敦煌第237窟中的吐蕃赞普形象与上述第159窟相似，赞普的头发似为自顶向下辫成长条形的发辫，沿头部两侧斜披至肩后，也裹有高筒状的头巾，但其衣领不是三角形的大翻领，而似为于肩背处自后向前披围的一方布帛。由于此幅壁画遗有清人题记一则，上书“嘉庆二十三年五月十四日张成林重描各国王子”^⑨，所以有学者怀疑此壁画是否有可能经后人重描时对人物服饰线条、式样等有所改动^⑩，不过原来的基本形象尤其是头巾的式样与上面所列举的吐蕃赞普形象并无太大的变化。



图六

1. 马尔夏克想象复原的吐蕃王冠图 2. 马尔夏克想象复原的三角形纪念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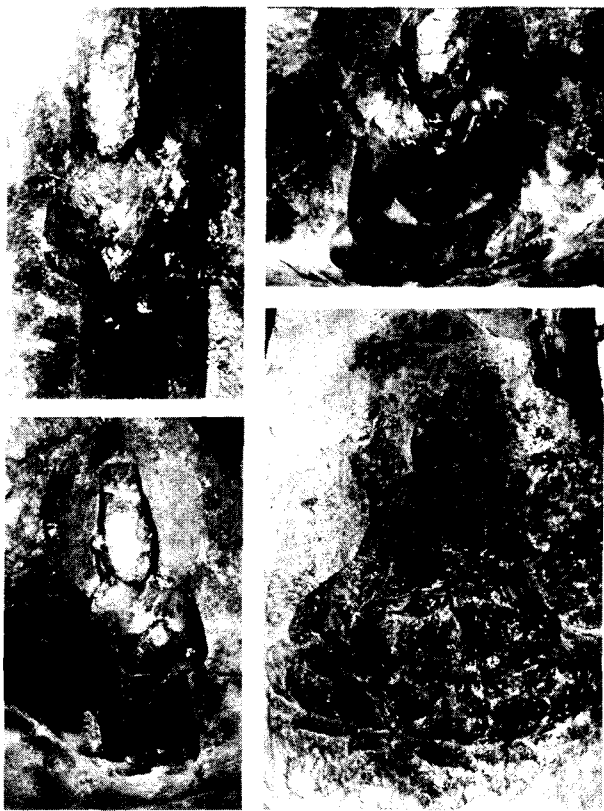
图七 青海玉树贝勒沟大日如来佛堂造像

从上述敦煌绘画资料中所见的吐蕃赞普服饰特点上来看，其头冠的式样有两种：一是只在头上缠裹的高筒状头巾；二是在这种高筒状的头巾上面再箍戴一顶带有花叶的王冠，如敦煌第158窟《佛涅槃变》壁画中的吐蕃赞普所戴王冠。

除此之外，在青海、西藏东部和四川西北部近年来发现的一批年代为吐蕃时期的大日如来石刻造像，主尊大日如来通常被认为是吐蕃赞普的化身，其头上的冠饰也可作为我们考察吐蕃赞普王冠形制的参考。例如，青海玉树大日如来雕像头部所戴高冠式样为高筒状的头巾外面再箍戴一顶花冠，花冠的式样与上述突厥王冠相似，也是在长条形的冠沿上缀以三条与冠沿相垂直的花瓣形冠叶（图七）^⑩。西藏昌都仁达摩崖造像的题材为大日如来佛像及八大弟子（八大菩萨）、二飞天等。其中主尊大日如来像为高浮雕，高约192、宽约152厘米，有桃形头光和椭圆形的身光，头戴高冠，饰耳环，高冠的式样如同青海玉树^⑪。近年来笔者调查的西藏昌都芒康县扎廓西沟摩崖造像（图八）和大日如来殿石雕的主尊及其胁侍像的冠式（图九），也均是在筒状的高头巾外面再戴上一顶花冠，花冠的形制均为与冠沿相垂直的多片叶片构成^⑫。上述这种吐蕃式样的头饰在卫藏地区佛教“后弘期”初期的壁画供养人形象中也有发现。宿白在考察山南札囊县札塘寺大殿壁画时观察到，“多数供养人在三角冠饰之后用头巾缠裹发髻成高桶状”，他认为这个传统一方面继承了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传统式

样，同时也有新的变化：“此种高桶状冠饰，虽与敦煌莫高窟吐蕃占领时期壁画中绘出的吐蕃贵族供养像相似，但冠饰前所列之三角形件却在后宏期藏传佛像、菩萨所习见”^⑬。同时他还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喀则地区夏鲁寺大殿门楼底层壁画所绘此类供养人的形象亦着有此高桶状冠饰者”^⑭。谢继胜对此种传承则认为：“这种吐蕃头饰或许代表了一种札塘艺术家的怀念吐蕃诸王的情绪”^⑮。

通过上文所做的比较，我们可以认为马尔夏克将这批银质饰片缀合复原而成的王冠式样，具有一定的依据，与吐蕃赞普头上的冠饰也有某些相似之处，从而可以基本上确认这批流散于海外的银饰残片的确有可能原系王冠上的银质构件。从其形制特点和造型风格上来看，也与蒙古国发现的毗伽可汗金冠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只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些银饰片是和一些用来随葬的物品一同下葬于墓葬当中的，所以马尔夏克复原的这两顶吐蕃王冠的性质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即它们本来即为墓主人夫妇生前所使用的王



图八 芒康扎廓西吐蕃摩崖造像中的人物冠饰



图九 芒康县大日如来殿中的吐蕃造像头饰

冠，死后随之一同入葬；第二种则是专门为死者下葬而制作的随葬品。而无论属于哪一种性质，它们与上述图像资料所反映的吐蕃赞普冠饰在形态上仍然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同，其原因我们推测或许是由这类王冠实际使用时的情形造成的。换言之，这类贵重金属制作的王冠可能并非直接戴在王者头上，而很有可能是戴在头巾的外面，其程序如同上文中所见到的吐蕃赞普冠饰，首先是将头巾按照一定的式样裹成高筒状，然后再在头巾的外面箍戴王冠，由头巾和王冠两者共同组成吐蕃赞普的冠饰。

此外，对于马尔夏克所作的吐蕃王冠复原，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如上所述，上述流散在海外的这批可能原系王冠饰件的银饰片主要有三种形制，其中长条形的饰片可用作王冠的冠沿，长方形及“山”字形的饰片如果按照突厥王冠和图像资料所反映的吐蕃王冠的式样来看，均可作为垂直于冠沿的冠叶连缀于冠沿之上，这都是可以接受的意见。而唯有呈“U”字形的饰片如果按照马尔夏克的理解，是作为王冠的背冠使用的，在组合方式上也同样垂直于冠沿，直立在冠沿上。但是，这种形制的王冠在上文所举图像资料所见的吐蕃冠饰中并无同样的例子可以佐证。如果我们同意马尔夏克所作的复原，那么可以想象这是在相当于吐蕃赞普筒状高头巾的部位，再加上这样一条竖立的“U”字形背冠，而这类冠饰目前在考古发现的图像资料中还未曾见到过。这究竟是马尔夏克在对这批银饰片的处理和想象复原上存在着问题，还是的确在吐蕃时期曾经存在过这样一类王冠的式样，只有等待今后

积累更多的考古材料才有可能做出进一步的推测。

三、突厥与吐蕃在丧葬文化上的联系

突厥和吐蕃都是中国唐代十分活跃的草原民族，吐蕃在公元7世纪初由其著名的赞普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各

部，建立了吐蕃王国，这个高原王国在发展强大的过程中，曾经与其周边地区民族发生过密切的联系，藏族史籍《贤者喜宴》记载：“是时自东方汉地及木雅（minyag）获得工艺与历算之书，自南方天竺翻译了诸种佛经，自西方之胡部泥婆罗，打开了享用食物财宝的库藏，自北方霍尔（hor）、回纥（yugur）取得了法律及事业之楷模。如是，松赞干布遂统治四方，边地之全部受用财富悉聚于（松赞干布）权势之下。”^⑧学术界通常将古藏语中所称的霍尔（hor）比定为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其中也应包括突厥、回纥等在内。近年来，有学者研究认为，吐蕃由于与突厥在地理位置上相邻，可能很早就发生过交往与联系，松赞干布在吐蕃王国的制度建立过程中，曾经向突厥学习，在行政、职官、军事、法律等项制度的建立上均取法于突厥，其后突厥对于吐蕃的影响也持续不断。在有关二者的丧葬习俗方面，有学者也曾指出：“突厥统治之西域与吐蕃接境，突厥文化又大量输入吐蕃，葬俗也当不例外”，尤其是在以羊马献祭、“以刀劈面”表示哀痛等特殊丧俗方面，突厥的风俗习惯也影响到了吐蕃^⑨。

笔者注意到，在突厥毗伽可汗陵园的发掘现场，从照片上可以观察到陵园内倒塌着毗伽可汗的墓碑，据林梅村介绍，在突厥汗国灭亡之后，此碑遭到仇敌严重破坏，被打成了许多碎块，蒙古与土耳其联合考古队首先将墓碑的三块主要碎块进行了拼合^⑩。从林梅村所提供的几张照片上看，倒塌在地的石碑似有动物形状的碑座，但由于照片太小，我们无法核实碑座上的动物是何种

门类,只是仍可分辨出动物有头,躯体蜷伏在地,后肢弯曲向前伸出,石碑下方有碑榫结构,可与动物碑座之间相连接^①。这个情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吐蕃王国王室贵族墓地——西藏山南琼结县吐蕃王陵(也习称为“藏王墓”)陵园中所保存的两通陵前石碑。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近年来所作的勘测工作,其中赤德松赞墓碑现位于琼结河右岸,在第7号陵赤德松赞墓东侧,石碑通高7.18米,由碑帽、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帽顶宝珠与碑帽、碑帽与碑身、碑身与碑座皆为榫卯结构相连接,碑身高5.6米,碑下为龟趺座。过去学者多据此将与石碑相对应位置上的陵墓墓主定为赤德松赞^②。琼结藏王墓地中的另一通石碑为赤松德赞记功碑,石碑体通高5.24米,也是由碑帽、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以石榫结构连接。与藏王墓类似的吐蕃陵前石碑的碑座还在西藏朗县列山吐蕃墓地中发现过,上面的墓碑已经不存,但动物碑座保存情况尚佳。这通石碑的碑座位于列山墓地东区西北部,于1982年调查时发现,当时露出地面部分仅有27厘米,1993年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再次对该墓地进行考古调查时,将其全部清理出土,由此可知此碑座系用整石雕成,长120、残高66厘米,其形状为一龟形,头部已残缺,尚可辨识出龟的四肢,碑座正中有长方形的沟槽,可能系安置石碑所刻^③。由此可见,吐蕃赞普陵园中的墓碑与突厥可汗陵园中的墓碑也有着相似的特点,反映出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如果这个观察无误,那么我们进一步可以推测除陵园建筑之外,两者在随葬器物与冠服制度之间也许同样存在着这种联系和交流。前节中我们分别比较了突厥毗伽可汗陵园中出土的金冠与流散于海外的吐蕃银冠上残存的饰片,不难发现,两者之间除造型上可能有一定差异之外,所采用的冠叶的式样、冠叶上的装饰性纹饰、在金银质地的王冠上镶嵌宝石的做法等诸多方面的确具有许多相似之点,这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突厥与吐蕃在丧葬礼俗上的相互联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我们不否认突厥与吐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在地域上相毗邻,在民族习性上相接近,随着各自势力的扩张,自然会产生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影响。这一

点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两方面都有所反映。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还应当看到,突厥和吐蕃在丧葬礼仪制度方面,除了保留其自身具有民族与地域特点的诸多传统习惯之外,二者同时也都还与唐代中原王朝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受到先进的唐代中原文明的影响。前文中所分析比较的突厥毗伽可汗陵园和吐蕃藏王陵园中所保存的石碑,不仅碑体本身从动物形碑座(龟趺)、碑身的形制、碑体的石榫结构等方面均具有浓厚的中原文明影响的色彩,笔者认为这种在陵园中设立石碑、石狮的做法,也都是直接受到唐代陵墓制度影响的产物^④。意味深长的是,即便是本文中分析比较的突厥王冠与吐蕃王冠,虽然其形制与装饰特点更多带有中亚与北方草原文化的风格,但出现在这些王冠的金银质冠叶上所装饰的缠枝花草、忍冬纹、鱼地纹等纹样,却均是一派唐风,将中原文化与北方草原文化的传统和谐地融为一体,体现出我国各民族之间的交融互动。

四、结语

综上所述,简要总结笔者本文的研究结论:第一,通过考古学的比较可以初步认定,蒙古发现的这件突厥毗伽可汗王冠与现流传于海外的一批吐蕃时期的银质器物残片具有若干相似的特点,后者经过考古复原很可能展现出吐蕃时期的一种王冠式样,由此表明突厥和吐蕃在丧葬习俗及服饰冠带方面有诸多共同之点。第二,突厥与吐蕃由于地理接近、习性相近,二者在文化上相互影响,可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但与此同时,除了这些具有民族与地域特点的传统因素之外,如果从陵园建筑、碑碣制度等宏大的视野和王冠在金银装饰花纹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丰富细节等各个方面来加以考察,无可否认的是,二者也都同时还受到唐代中原文化的影响,从中借鉴、模仿,并融汇本民族的传统习惯,最终形成我国北方民族独具特色、但同时又具有中华民族共性的文化传承。

注释

①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原刊于《上海文

- 博》2005年1期,后收入其论文集《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第224~235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 ②⑬⑭林梅村:《毗伽可汗宝藏与中世纪草原艺术》,《松漠之间:考古新发现所见中外文化交流》彩版第11图,第226页,第224页插图2,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
- ③霍巍:《一批流传海外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5期。
- ④有关这批器物出土情况的推测可参见霍巍:《一批流传海外吐蕃文物的初步考察》,《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年5期。但需要更正的是,此文中称“这批文物较为集中的出土时间推测应为19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初叶十多年间”,与笔者原文不符,系编辑者的误改。笔者原文为“这批文物较为集中的出土时间推测应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叶十多年间”。
- ⑤有关马尔夏克对这批吐蕃金银器的初步研究意见,系马尔夏克逝世前正在撰著的一部手稿《中亚的吐蕃帝国:公元7~9世纪》(The Tibetan in Central Asia: 7th~9th centuries)中的手绘插图,承蒙美国友人见示并同意在本文中使用时,特此表示鸣谢!并谨以此文对马尔夏克这位伟大的中亚考古学家表示诚挚的纪念。
- ⑥⑦⑧ [法] 海瑟·噶尔美著、熊文彬译:《早期汉藏艺术》,第37页,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
- ⑨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第107~108页,文物出版社,1993年。
- ⑩杨清凡:《藏族服饰史》,第56页,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⑪张宝玺:《青海境内丝绸之路及唐蕃故道上的石窟》,《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分公司,1996年。
- ⑫陈建彬:《关于西藏摩崖造像的几个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四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 ⑬霍巍:《试析西藏东部新发现的两处早期石刻造像》,《敦煌研究》2003年5期。
- ⑭⑮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第69~70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
- ⑯谢继胜:《西夏藏传佛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第243页注释3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 ⑰黄颢:《贤者喜宴摘译(二)》,《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1期。
- ⑱陆庆夫、陆离:《论吐蕃制度与突厥的关系》,《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4期,2005年7月。
- 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藏王陵》,第164页,文物出版社,2006年。
- ⑳索朗旺堆、侯石柱:《西藏朗县列山墓地的调查和试掘》,《文物》1985年9期;西藏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西藏朗县列山墓地殉马坑与坛城形墓试掘简报》,《西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 ㉑霍巍:《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第17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责任编辑 朱艳玲)

The Turki Crown and the Tubo Crow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a Turki royal crown found in Mongolia and fragments of silver objects spread abroa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m, and the latter was possibly a kind of royal crown of Tubo. The Turks and Tubo Kingdoms share many commons in terms of their funeral customs and the dresses, demonstrating a close relationship. Meanwhile, it has to be emphasized that both of them were strongly influenced by the culture of Central Tang China. The Turki and Tubo imitated the Tang culture, and finally formed their own traditions with features borrowed from northern nationalities.